

# 中俄元首会晤释放出强大正能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举行视频会晤，并发布联合声明，正式决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这一条约签署于2001年7月，其中的一个条款规定：当缔约双方中的一方认为受到侵略威胁时，双方将为消除威胁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

西方媒体在描述中俄关系时经常使用“准同盟”这样的字眼，但中俄官方从未接受这一描述，两国自我定义的关系是“结伴不结盟”，双方均强调两国关系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是21世纪政府间关系的典范。

两国星期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又有诸多重要新表述，其中第二条说：俄罗斯需要繁荣稳定的中国，中国需要强大成功的俄罗斯。中俄视彼此为优先合作伙伴，将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安全、军事、经贸、人文、国际等领域的协调与合作。

联合声明表达了共同的军控立场，并且谈了多项相关问题，比如批评美国

退出军控领域一系列重要国际协定并在世界各地部署反导系统，声明还主张各国都承诺不首先在外太空部署武器。

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中俄两国首次联合定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双方还表示反对打着“民主”和“人权”幌子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单边强制性制裁。

一段时间以来，华盛顿的一些政治和舆论精英对给中俄关系泼冷水充满兴趣，然而那些人的鼓噪反映了他们的格局低得惊人，根本无法理解中俄关系不断强化的战略支撑。这次声明像过去一样内嵌了两国外交经常阐述的核心概念，如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极化国际关系体系，强调“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等等，还结合新情况反对利用疫情和病毒溯源搞污名化、政治化，中

方表示坚定支持俄方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采取的有力举措，坚定支持俄方办好自己的事。

华盛顿想弱化中俄关系，有利于它对中俄单独施压、各个击破，不仅是幻想，而且是狂想。中俄全面战略协作远非为应对压力的临时“抱团取暖”，而是融入了两国对21世纪大国关系的真正理想，对接了两国长期的根本利益，并且释放了中俄互为最大邻国所蕴含的丰富地缘优势和潜力，因而它是不可破坏的。

换句话说，想破坏中俄关系的那些力量，出发点不仅低而且猥琐，跟中俄关系本身的质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根本上不了同一个赛道。

美西方舆论经常从“谁起了主导作用”“谁更有求于谁”等角度议论中俄关系，那是因为美西方的同盟关系就是由

美国主导的，它们从根本上服务于美国的霸权战略，美国为此给盟友一些“提供

保护”的小甜头。而中俄全面战略协作是完全平等的，维护这样的平等合作与维护本国根本利益高度协调，那些西方人的经验和价值观支持不了他们对中俄关系的理解。

比如中俄都不会要求对方如何处理与美国或其他第三国的关系，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过。但是美国就会强行要求盟国如何处理同中俄的关系，甚至因此发生摩擦，这就是区别。然而中俄针对国际重大问题的协调度不仅不低于美国和它的盟友，反而很多时候能够更好协调立场。

世界因为有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更有和平与稳定的保障，霸权受到制衡，公平正义受到强有力支持。中俄关系从未被用来制造地缘政治动荡，两国从未实施过针对第三方的威胁，说中俄关系是21世纪国际关系的典范，真是一点也不为过。▲



## 欧美关系，谁在三心二意

崔洪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陪同拜登总统参加完G7、北约、欧美和美俄峰会后马不停蹄，再度出访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布林肯的“回马枪”既是想趁热打铁、延续拜登对欧洲的“魅力攻势”，用“去蓬佩奥化”来跟进“去特朗普化”，也想要通过在“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欧洲周边安全等双多边议题上的姿态，来释放美国国内对拜登政策调整的压力。当然，落实美欧对华“共识”、打消欧洲的“三心二意”，也是布林肯访欧议程重点。

首先，“去蓬佩奥化”是首要任务。布林肯的身世背景、旅欧经历甚至谈吐气质，都让他在欧洲收获了好人缘，也很自然地成为了他的前任——样貌粗笨、谈吐粗俗的蓬佩奥的对立面。布林肯也很刻意地去营造这种对立，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归来”+“特朗普例外”的叙事。因此布林肯在行前对欧美关系和德法同行都不吝赞美之辞，不仅在德国和马斯把酒言欢并共同抨击“反犹主义”，也在法国大谈“巴黎岁月”并和勒德里昂亲密互动。对于依然脆弱的美欧关系来说，“去蓬佩奥化”的仪式感依然很重要。

布林肯的访欧行程是由一系列双多边活动串联起来的，除了对德、法、意的双边访问外，布林肯还要参加涉及利比亚、叙利亚局势，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的多边会议以及G20外长会，甚至还会花时间去一趟梵蒂冈。布林肯想要借此显示的是美国正“回归多边主义”的姿态，一个愿意四处插手而不是任性退群的美欧关系来说，去蓬佩奥化”的仪式感依然很重要。

其次，美欧之间还有难啃的“硬骨头”。布林肯和蓬佩奥在外表和气质上的差异，无法换算成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在对欧政策上的差异。布林肯在首站德国碰到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问题，就是一根涉及德美地缘政治和能源产业分歧的“硬骨头”。此前，为了给拜登的欧洲行营造气氛，美国政府部分解除了针对该项目参与者的制裁，但却遭到了民主共和两党几乎一致的反对。对此布林肯也一直未松口，直言“反对‘北溪-2’项目”，认定它就是“服务于俄罗斯地缘战略的能源工具”。无论如何秀亲热，布林肯此次德国之行显然没有在“北溪-2”问题上讨得好彩。

除了“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问题外，布林肯为了落实此前各场峰会成果，还得接着和欧洲谈抗疫合作、经济复苏以

及被称为B3W的“高标基建”等议题。但这些问题似乎也只是谈淡而已，一方面欧美之间的人员流动尚未相互开放，另一方面美国仍不肯下血本让欧洲获益，再多的合作议程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在地区问题上谈利比亚、叙利亚可以，但伊朗或以色列问题就是难啃的硬骨头。给中俄分门定位也比较容易，但欧美缺乏在“高标基建”这类吃力不讨好的领域真正开展合作的内生动力。在表面上达成对俄对华的所谓“欧美共识”之后，双方“立场一致、做法不同”仍是让拜登和布林肯大伤脑筋的地方。

再次，美欧对华“合而不同”。就在拜登前脚走布林肯后脚来之间，一些欧洲国家政要显然不愿让“修复欧美关系”被直接解读为“为对抗中国结盟”，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基民盟主席拉舍特都出来找平衡、打圆场。这对于的确想拉着盟友针对中国的美国来说，着实有些丢脸且光火。因此尽管中国不是布林肯访欧的公开话题，但显然无法回避。

也许是为了对冲马克龙和拉舍特等人的声音，28日有报道称，英国鹰派政客和美国一科技政策智库鼓动西方盟友组成所谓“贸易北约”以对抗中国。该提议是让西方国家按照北约的路线建立一个以贸易为基础的联盟。根据北约的规则，成员国统一保护任何受到攻击的其他成员。不过该提议并未得到官方支持，一些分析人士也对这一概念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因为这样一来，美欧不仅在安全防务上捆绑，在经贸上也会形成深度捆绑，这与欧盟日益强调战略自主似乎背道而驰。

从布林肯的有关表态来看，美欧除了在对华“合作、竞争、对抗”的三重定位上似乎一致外，在与中国对抗的目的、手段以及领域上都有不小的分歧，否则布林肯就没有必要用“美国不是针对中国而是为维护规则，而中国（恰巧）正在挑战规则”这样绕口又蹩脚的说辞来再次寻找共识了。

就在布林肯到访前，意大利外长迪马约在和王毅外长的通话中，再次强调双方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和要通过B3W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对冲的G7共识似乎也很难兼容。如果布林肯真的有心，他就不得不奔波于美欧之间，不断地和在质疑、犹豫和反复之间切换的欧洲做“统一思想和行动”的工作。

在“共同对华”的这条路上，美欧注定走得艰难。▲（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由于伊朗和以色列都迎来新的政府，而美国拜登政府在取消大约1040项特朗普时期对伊朗的制裁问题上犹豫不决，所以伊核协议的前途似乎又进入新一轮不确定期。

从目前的态势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5日表态，如果谈判无限期拖延下去，美国回到伊核协议将“非常困难”。伊朗方面随即做出针锋相对的反应，称只有在在美国取消制裁并由德黑兰确认后，伊朗才会重新全面遵守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与此同时，长期持强烈反伊朗立场和政策的以色列表示，其反对恢复伊朗核协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立场不会改变。

在笔者看来，伊核协议谈判在当前再度面临严峻考验，其最深刻的根源仍在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伊之间长期对抗的结构性矛盾。而强硬保守派莱希当选伊朗总统后，西方和伊朗都在以示强的方式进行试探和博弈，美国特朗普政府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伊朗突破伊核协议导致的技术性问题尤其是伊朗核能力的变化等技术性问

## 伊核协议面临三重困境

刘中民

题，以色列作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不断向美国和西方施压，是导致伊核问题再现紧张的具体原因。

美伊双方的长期对抗，是制约伊核问题和伊核协议谈判屡次陷入困境的结构性矛盾，只有美伊双方放弃敌视和对抗，形成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包括伊核问题在内的美伊矛盾才有望彻底走出困境。

从伊朗方面看，反美、反西方、反以色列作为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直接关系到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从美国方面看，美国在政治上长期寻求颠覆伊朗伊斯兰政权，在经济上长期制裁导致伊朗经济深陷困境，在军事上不断威慑使伊朗的不安全感不断加剧，都是伊朗长期奉行反美主义的根源所在。

自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以来，美伊双方博弈的内容既包括伊核问题本身，但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是伊核问题之外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其核心是双方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地缘政治对抗。因此，一旦伊核协议的环境和气氛有所紧张，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双方的深刻不信任就会立即凸显，这是当前伊核协议谈判面临严峻挑战的根本原因。

自伊核问题产生以来，美国和伊朗双方国内政治的变化，尤其是双方政府更替导致的彼此在伊核问题尤其是伊核协议谈判上的节奏难以合拍，是导致伊

核协议不断陷入困境的国内政治根源。

自2003年伊核危机出现以来，美国经历了小布什政府(2001-2008)、奥巴马政府(2009-2016)、特朗普政府(2017-2020)，直到当前的拜登政府，其在伊核问题上的政策经历了“强硬—缓和—强硬—有限缓和”的变化。而同期伊朗经历了哈塔米政府(1997-2005)、内贾德政府(2005-2013)、鲁哈尼政府(2013-2021)，其在伊核和对美政策上经历了“缓和—强硬—缓和”的变化。

在上述历史演进中，双方均处在实行“缓和—强硬”政策的交集时期十分短暂，如奥巴马执政末期和鲁哈尼执政初期，其他更多是“强硬对强硬”或“强硬对缓和”的不合拍时期。因此，美伊双方关系在彼此发生政府更替后走向更加紧张的对抗，似乎已经成为美伊关系的“铁律”。

另外，以色列扮演着掣肘伊核协议的特殊角色。波斯民族和犹太民族双方不仅在历史上长期友好，在当代也曾共同作为美国盟友而密切合作。双方关系出现矛盾始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反美、反以成为伊朗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但即使如此，以色列在两伊战争中仍与伊朗保持了密切合作。

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真正恶化始于冷战结束后，双方围绕中东和平进程尤其是巴以问题、伊核危机与伊核协议、“阿拉伯之春”尤其是叙利亚内战问题的矛盾不断加剧，双方在军事和安全领域针锋相对的对抗日趋突出，导致双方的敌意不断加深和固化。

伴随拜登上台后美国启动重返伊核协议的谈判，作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以阻止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在此背景下，以色列与伊朗的明争暗斗此起彼伏。当前，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因美国试图重返伊核协议更趋紧张，甚至有舆论担心以色列会对伊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从伊核协议谈判的处境和前景看，尽管当前美伊矛盾再度激化，伊核协议谈判很可能因伊朗政府的保守化和西方的强硬反应再度受挫和反复，以色列也会不断作为重要的第三方施加消极影响。但美伊彼此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战略对重启伊核协议的需求依然巨大，因此伊核协议谈判应该不至于走向全面崩盘。美伊只有实现真正的和解，放弃意识形态斗争和地缘政治对抗，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海湾和中东的安全困境才有可能化解。▲（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